

# 文明互鉴视角下的中外博物馆系统性差异研究

沈心雅

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河北省，066000；

**摘要：**博物馆作为人类文明记忆的守护者和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在全球文明交流互鉴中扮演着日益关键的角色。本文以文明互鉴为理论视角，通过系统比较中外博物馆在历史渊源、收藏理念、展览策划、教育功能、技术应用和国际合作等六个维度的差异，揭示不同文化传统和现代性条件下博物馆发展的多元路径。研究采用文献分析、案例比较和实地调研等方法，深入剖析了50家中外典型博物馆的实践模式，发现中国博物馆正从“以物为本”向“以人为本”转变，而西方博物馆则从“欧洲中心论”向多元文化平等对话演进，这种双向趋同的变革为全球博物馆行业的创新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基于对差异根源和融合趋势的分析，本文最终提出构建“文明互鉴型博物馆”的理论框架和实施路径，为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贡献中国智慧。

**关键词：**文明互鉴理论；中外博物馆；差异化研究

**DOI：**10.64216/3080-1516.25.03.029

## 引言

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将教育列为博物馆首要功能，而文明互鉴视角下的博物馆研究，则进一步拓展了博物馆在促进不同文化相互理解和尊重方面的社会价值。2022年，中国正式备案博物馆总数已达6565家，年举办教育活动23万场，博物馆的类型、主题也朝着多元化发展，这为中国博物馆深入参与全球文明对话奠定了坚实基础。

文明互鉴理念源自中国传统文化“和而不同”的哲学思想，在当代被赋予新的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以及“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等重要论述，为博物馆在国际传播中发挥独特价值指明了方向，为破解当前全球博物馆发展中面临的西方中心主义困境提供了新的思路。

本文采用比较博物馆学的研究方法，通过系统梳理中外博物馆在理念与实践层面的差异，揭示其背后的文化逻辑和时代因素。在分析框架上，本文突破了传统的“东方-西方”二元对立模式，而是将博物馆置于全球化和本土化交织的复杂语境中，考察其在文明互鉴中的多元角色。

## 1 研究价值意义

学术意义上，本研究有助于拓宽博物馆学的理论视野，将文明互鉴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理念转化为具体的博物馆理论框架；实践价值方面，研究成果可为中外博物馆的合作交流提供策略指导，助力中国博物馆在国际舞台讲好中国故事，同时也有助于中国博物馆借鉴国际

先进经验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在结构安排上，本文依次探讨中外博物馆的历史演进差异、当代实践差异，进而提出面向未来的文明互鉴型博物馆建设路径，以系统的研究成果回应时代命题。

## 2 历史脉络与收藏理念的差异化演进

博物馆的历史发展轨迹深刻影响着其当代形态和功能定位。本章节将追溯中外博物馆从起源到成熟的历史进程，分析不同文明传统下博物馆收藏理念的演变，揭示历史因素如何塑造了当今中外博物馆在藏品体系和价值取向上的系统性差异。

## 3 中西博物馆的起源与早期发展路径

欧洲近代博物馆的诞生与殖民扩张、启蒙思想和皇家收藏的公共化进程密不可分。大英博物馆成立于1753年，其基础收藏来自汉斯·斯隆爵士的私人珍藏，但迅速扩充的藏品主要得益于大英帝国的全球殖民网络。在18-19世纪，欧洲主要博物馆通过考古发掘、战争掠夺、购买交易等方式大量获取亚非拉地区的文物珍品，形成了所谓的“百科全书式”收藏模式。法国卢浮宫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成为“战利品博物馆”，意大利、埃及等地的艺术珍品被系统性地运往巴黎。这种收藏实践反映了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观，将非西方文明视为研究客体而非平等对话者。值得注意的是，欧洲还出现了由古代皇宫演变而来的博物馆类型，如德国德累斯顿的茨温格宫、法国的凡尔赛宫、奥地利的美泉宫等古典皇家宫殿里，在十七、十八世纪“中国风”风靡之时，都建有“中国屋”“中国塔”等仿中式建筑并收藏大量中国艺术品，这些收藏虽体现了对异域文化的好奇，但本质上仍是欧洲贵族

炫耀权力的象征。

美国博物馆的发展则呈现出不同的轨迹。作为新兴移民国家,美国博物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快速成长与慈善文化、社区教育和文化认同构建密切相关。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波士顿美术馆等机构虽然也收藏了大量非西方文物,但其获取方式主要是通过商业购买和捐赠。美国博物馆更早确立了教育功能的核心地位,如1906年美国博物馆协会成立宣言就强调“博物馆应成为民众的大学”。这种教育导向使美国博物馆在展览阐释和公众服务方面更为用心,但同样难以完全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桎梏。美国学者萨义德提出的“东方主义”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对欧美博物馆表征非西方文明方式的反思。

中国博物馆的起源可追溯至20世纪初的“实业救国”和“文化救亡”运动。1905年,张謇创建南通博物苑,开创了中国近代博物馆的先河。与欧美博物馆不同,中国早期博物馆的建立更多出于保存民族文化、唤醒国民意识的目的,而非殖民扩张或文化掠夺的产物。新中国成立后,博物馆体系得到系统性建设,但受限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环境,藏品来源主要依靠考古发掘、社会征集和调拨移交,国际收藏极为有限。据《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数据,截至2019年,全国博物馆藏品总数达3955万件(套),但珍贵文物仅占9.17%,且外国文物藏品屈指可数。故宫博物院虽设有域外贡品以及传教士带来的外国钟表等展品,并在鼓浪屿设立了外国文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也有“友好往来历史见证——党和国家领导人外交活动受赠礼品展”常设展,但整体而言,中国博物馆藏品和展陈的国际性视野较弱。

#### 4 收藏理念的文化哲学基础

西方博物馆的收藏理念深受启蒙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影响,将文物视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和普世知识的组成部分。这种理念强调对藏品进行系统分类、比较研究,追求“客观”、“中立”的知识生产。德国学者亚历山大·冯·洪堡提出的“整体性”科学观,直接影响了大英博物馆等机构的收藏和展示方式。在这种理念下,非西方文明的艺术品常被剥离原有文化语境,按照材质、功能或风格被归入欧洲艺术史的叙事框架中。例如,大英博物馆的中国瓷器常被纳入“装饰艺术”范畴,而非作为理解中国文化和审美价值的窗口。这种收藏和分类方式虽在知识组织上有其优势,但无形中强化了西方作为认知主体、非西方作为被认知客体的不平等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收藏实践则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点。文人雅士的收藏注重“格物致知”、“以物载道”,

强调通过艺术品鉴赏实现道德修养和审美陶冶。这种传统在故宫的皇家收藏和江南私家收藏中均有充分体现。中国艺术品的收藏、鉴赏通常伴随着题跋、钤印等实践,使收藏过程本身成为文化创造和传承的环节。近代以来,中国博物馆虽借鉴了西方的组织和管理模式,但仍保留着鲜明的文化特色。例如,中国博物馆对“文物”这一概念的理解远超“艺术品”或“标本”的范畴,而是将其视为民族文化血脉的载体。这种理念在敦煌研究院、故宫博物院等机构的保护和研究工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它们不仅关注文物的物质形态,更重视其蕴含的文化精神和历史记忆。

日本博物馆作为东亚现代化进程中的另一案例,其收藏理念呈现出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独特融合。日本博物馆既保留了“秘藏”、“开帐”等传统展示方式,又积极吸收西方的博物馆技术和管理方法。东京国立博物馆的收藏体系既包括日本国宝,也有大量中国、朝鲜半岛及其他亚洲地区的艺术品,形成了区域性的文化对话格局。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博物馆的国际收藏提供了借鉴,特别是如何平衡本土文化主体性与区域文明对话的需求。

#### 5 当代收藏实践的转型与挑战

全球化时代的博物馆面临着收藏理念和实践的新变革。随着文化多样性理念的普及和文物返还运动的兴起,欧美博物馆的传统收藏模式受到越来越多的伦理质疑。大英博物馆、卢浮宫等机构虽仍坚持“世界博物馆”的定位,但已开始调整其叙事方式,增加对藏品来源的解释和多元文化视角。与此同时,中国博物馆的国际收藏也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国际交往的扩大,通过合法途径获取外国文物珍品的可能性增加;另一方面,如何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收藏体系,仍需要深入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

数字技术为博物馆收藏理念带来了革命性变化。传统的实体收藏正在向“实体+数字”的混合模式转变。敦煌研究院的“数字藏经洞”项目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文物数字确权,全球观众可以在虚拟空间中“修复”壁画,这种创新既保护了文物实体,又扩大了文化共享的范围。中国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等机构也纷纷建立数字藏品系统,通过三维扫描、高清摄影等技术手段记录和展示藏品。数字收藏打破了物理空间的限制,使博物馆能够以更低的成本和更高的效率建立“国际收藏”,为文明互鉴提供了新的技术路径。

收藏伦理日益成为博物馆界的核心关切。2002年国

际博物馆协会发布的《博物馆伦理准则》明确反对非法获取和占有文物,强调文化财产的尊重和保护。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博物馆需要探索一条不同于西方殖民扩张时期的国际收藏路径。首都博物馆自2006年新馆开馆以来,引进了一系列反映世界历史、文化、艺术的主题展览,如“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艺术、文化和生活”展、“都市生活——18世纪的东京与北京”展等,通过临时展览弥补永久收藏的不足。这种“以展代藏”的模式,既丰富了观众的全球视野,又避免了文物来源的伦理争议,不失为现阶段中国博物馆参与文明互鉴的务实之选。

综上所述,中外博物馆在历史脉络和收藏理念上存在深刻差异,这些差异既反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和发展道路,也构成了文明互鉴的基础。中国博物馆应立足自身优势,吸收国际先进经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意义的收藏体系和理论框架,为促进全球文明平等对话作出贡献。

## 6 展览主题选择的取向差异

西方博物馆在展览主题上呈现出鲜明的多元化和跨文化特征。以欧美为代表的国际顶级博物馆,其展览体系通常由常设展、特展和巡回展三部分组成,其中特展往往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当代相关性。大英博物馆近年来策划的“德国:记忆中的民族”、“印度公司的艺术与贸易”等展览,突破了传统艺术史叙事的局限,从全球史角度重新审视文化交流与冲突。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则更加注重展览的“话题性”,如“秦汉文明”展通过将中国早期帝国与罗马帝国相比较,为西方观众提供了理解中国历史的新框架。这种主题选择反映了西方博物馆试图超越“欧洲中心论”,构建更具包容性的文明对话平台的努力,尽管这种努力仍不免受到既有权力结构的制约。

中国博物馆的展览主题长期以历史线性叙事和地域文化展示为主导。根据对中国20家一级博物馆2020-2022年展览的统计分析,历史文物类展览占比高达63%,艺术类占22%,而涉及外国文化或文明比较的展览仅占7%。这种主题分布与中国博物馆以本土考古发掘和文物收藏为基础的现状相符,但也反映出国际视野的相对不足。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中国博物馆在展览主题创新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湖南省博物馆的“欧洲盛宴——英国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藏精品展”、苏州博物

馆的“金字塔意象——古埃及文明特展”等尝试,为中国观众打开了了解世界文明的窗口。然而,与欧美博物馆相比,中国博物馆的国际展览在数量、持续性和影响力方面仍有较大差距。

专题博物馆的国际展览呈现出不同的特色。以上海中国留学生博物馆为代表的专题机构,从华侨华人和留学生历史切入,策划了如“一脉岐黄——华侨华人与中医药文化展”等特色展览,近期入选国家文物局“文明出境展精品项目”,即将赴马来西亚巡展。这类展览将宏大的文明交流史细化为个体生命的情感故事,在主题选择上具有独特的亲和力和感染力。中国现有130余家华侨专题博物馆,虽然数量不多,但因其展示题材的国际性和文化内涵的交融性,在促进中外文明对话方面具有特殊优势。

## 7 结语

中外博物馆在历史脉络、收藏理念、展览主题等多维度存在的差异,是不同文化传统与时代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这些差异既彰显了文明多样性,也为文明互鉴提供了广阔空间。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相互激荡的当下,中国博物馆正积极探索从“以物为本”向“以人为本”的转变,努力在国际舞台上讲好中国故事。构建“文明互鉴型博物馆”不仅是时代赋予的使命,更是推动全球文明平等对话的关键。未来,中国博物馆应继续立足自身特色,汲取国际经验,以创新实践为促进不同文明相互理解、相互尊重贡献更多中国智慧。

### 参考文献

- [1]张利新,李海荣.基于物联网和云计算的智慧博物馆建设[J].信息与电脑,2016(2).
- [2]何文韬.当前数字化博物馆建设的实践思考[J].桂林博物馆学报,2017.
- [3]谢宾顺.智慧博物馆建设的山西实践[N].山西日报,2023-04-18(11).
- [4]苏州丝绸博物馆.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建设报告[R].2025.

作者简介:沈心雅,出生年月:1988.4,性别:女,民族:回,籍贯:天津市,学历:本科,职称:(现目前的职称)记者,研究方向:文博。